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view

二零零四年第二辑

Billy K.L. So : 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The South Fukien Pattern, 946-1368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2000 , xx+469

苏基朗著：《刺桐梦华录》

李润强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虽然“闽南”一词最早出现于十二世纪，至明代才习见于各种文献，但是，早在晚唐五代时期，闽南地区已经显现出很强的经济优势，宋元时期，更是发展成为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区。闽南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福建东南沿海地方，主要包括泉州、漳州、厦门、莆田等地，其中泉州在中古时期，一直是东南重要的港口城市和经济中心，其地位不亚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及七十年代的香港。但是，明代之后泉州逐渐衰落并从史家的目光中淡出，直至二十世纪初，经日本桑原隲藏等著名学者考证确认，泉州的确是中古外国文献及马可波罗等多次记载的重要港口“Zaytun”，从此，中古泉州的研究得到了中外史学家的格外青睐，并取得了大量重要的成果，如桑原隲藏《唐宋元时代中西交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蒲寿庚考》（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张星烺《中世纪泉州状况》（《史学年报》1929年第1期），还有方豪、罗香林、许清泉、陈达生、土肥祐子、庄为玑、陈高华、Hugh Clark、李东华等在这些方面都有贡献，两岸学人还主办出版了《海交史研究》、《泉州文史》等专门学术刊物。泉州研究至今经历了百年的历程。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苏基朗教授，长期从事泉州研究并取得瞩目成就，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一直潜心研究中古时期闽南泉州社会经济史，仅见于本书参考书目中的相关专著、论文就达十余种，如《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11月）、“Chinese Identity in the Traditional Context: The Case of Zayton.” *Humanities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4 (1995)、《两宋闽南广东外贸瓷产业的空间模式：一个比较分析》（台北《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1997）等等。他不久前出版的专著“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The South Fukien Pattern, 946—1368”（《中国沿海的繁荣、空间与制度——闽南模式（946—1368）》），作者取中文名为《刺桐梦华录》，“刺桐”为泉州的古称。本文以下简称《模式》），就代表了近年来中古闽南泉州研究的水平。

《模式》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十一章，作者从经济繁荣、空间因素及组织制度等三方面入手，阐述了中古时期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过程：中古闽南的经济周期”，包括第1—5章：1、公元946年前的闽南海疆。2、当地经济的腾飞（946—1087）。3、沿海贸易与跨行业的经济繁荣（1087—1200）。4、经济衰退与地方权力（1200—1276）。5、新统治秩序下的经济繁荣（1276—1368）及此后的发展。这个部分以朝代变迁为主线，概括地描述了作为东南海疆的福建，特别是闽南地区的发展周期和经济状况，阐述了中古以来闽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认为它大约经历了北宋前期的经济兴起、北宋后期南宋前期的全面繁荣、南宋后期的经济萎缩、元代的繁荣再现、明代的逐渐衰落等几个过程。闽南地区的发展核心，自唐至宋元均在泉州，明代开始转移到漳州，明末清初至今，厦门则后来居上。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部分是一部简明的闽南中古经济发展史。

第二部分“空间：自成地域体系的闽南”，包括第6—8章：6、中心综合区闽南。7、地域中心泉州城。8、地方经济的整合：闽南制陶业出口的一个案例研究。这个部分从空间入手，由外部至中心，由整体至局部，由系统至个案，考察了闽南泉州的城市体系、乡村结构、交通桥梁、建筑分布，并以制陶业出口为例，分析了在泉州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海外贸易，构建了闽南泉州兼具中心城市、港口城市功能，又有综合地域特征的城乡一体化体系。

第三部分“结构：闽南经济的运作成本分析”，包括第9—11章：9、贸易模式：商人、组织与知识。10、正式的制度约束：法律、所有权与契约。11、非正式的制度约束：理性、道德、信仰与社会关系网。这个部分着眼于社会结构，探讨了影响经济运作的多种社会因素，如由商人、社会组织、知识构成的地方贸易模式，法律、所有权、契约等制度约束因素，理性、道德、信仰、人际关系等软性制约因素，并深入分析了在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商人的经济行为模式。

除以上介绍的内容外，《模式》还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模式》借鉴西方学者的古代经济及城市发展理论，采用历史学、经济学等多种手段并用的方法，全面深入地探讨中古闽南经济和地方发展，阐发出一些新颖独到的结论。

百年来，学术界对于泉州研究，集中在中外交通史、艺术史、地方史及社会政治史等方面，但由于可量化的经济史料缺乏等原因，学界对五代宋元泉州的兴起等诸多问题，还缺少全面可信的解释，对泉州的城市经济研究也较为薄弱。这些难题的解决，不仅期待必要的史料和对已有史料新的解读方法，更需要一些相关理论和研究手段的引导。《模式》借鉴了 Skinner G William、Ronald Coase、Douglass C North（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等人的提出的经济理论及城市发展理论，将其运用到中古泉州研究之中，结果作者发现，其中别有洞天。

如 Skinner G William 认为，在中国的知识背景之中，空间概念是一个必需的框架，而这些脉络清晰的空间结构是以中心地理论及其空间的联系途径为基础的，其中主要包括不同水准之上的市场重建和城市系统，学者从这些地区的经济交流和行政控制之中，可以比较出各种人类现象的地域差异[参见 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no 1, 1964）、“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 no 2, 1985）]。苏基朗教授将 William Skinner 的宏观区域理论，引入到中古泉州区域经济的研究之中，他发现，由此涉及和阐述的中国经济史中的多维层面及其内容，正是其他学者此前不曾观察到的，象“中心综合区域”的理论模式，就特别适合考察中古泉州地区的经济状况，并可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视野（Introduction P4）。第六章“中心综合区闽南”，将原来分别进行的多项平面研究，包括地方行政区划与城市体系、家庭分布、乡村结构、道路交通等，均围绕闽南这个以泉州为中心的综合区域，进行多维地内在地组织衔接和综合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经济因素对泉州城的内部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由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作为全城经济命脉的商业核心，竟然出现于行政核心之外的城外南郊，主要的工业也远离州城，这说明当地的经济活动，确实是以商贸活动为支撑的，与此相应，政府对城市的管制作用也有所削弱。但是，

尽管泉州是当时东南商业中心，但是城市的政治功能在城市发展中仍然占居主导地位，官府等行政部门依然稳居于城市中心位置，在其两侧，又分布着地方精英的住宅，而商业核心区只能寄寓城区南郊，这说明，中古的泉州无疑还是一个行政管理为主导的城市。

《模式》指出，研究中古史，尤其是中古经济问题，可量化的资料比较稀缺，依据定性材料，可以使用某种概念抓取其中最具特征性的部分，但却缺乏深刻印象，有时还可能产生误解。《模式》涉及的两种研究方法，对解决这一问题很有探索意义。作者为了描述十至十四世纪闽南经济的发展历程，他做了细致的分期和编年，从而形成对经济发展过程的整体认识，并且力图突出各个阶段的不同经济特征，毫无疑问，这个工作是细致繁琐的，必须在搜集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方能展开，但作者强调，这种方法对研究经济发展史很有必要。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研究中获得与课题相关的、论据充分的认知，并运用多维的研究途径对这些认知予以交叉验证和确认，使我们构建一个对研究对象更加完整、更加合理的认识体系，从而避免可能产生的曲解，克服因史料缺乏造成的失误（Introduction P4）。

通过这些理论及方法的使用，作者确实以更加全面、独特的学术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

其次，以十至十四世纪的闽南地区为例，构建了一个考察中国经济社会及城市发展的研究模式——“闽南模式”。

《模式》系统描述了闽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其中以宋元时期为主，兼及隋唐、明代及以后的经济状况，但如果将书后“附录”中的《汉隋之际的福建》一文结合起来，无疑是一部从汉代至明清的泉州社会经济发展史，内容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建筑、工业手工业、边贸、军事、宗教、道德、中外关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城市固有的诸多因素的总和。但更值得瞩目的是，《模式》在考察以上因素及其内部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颇具理论意义的“闽南模式”。

对于这个新兴模式，苏基朗教授作了如此形象的表述：“所谓闽南模式，正如在本项研究中所介绍的那样，是一个多行业的繁荣历程。在本地的长期开发中，繁荣景象会从一个行业，如沿海贸易，荡漾到其它的行业，譬如农业和工业。作为这个整体发展的一个部分，闽南越来越多的地方和不断增长的人口，或者直接地从兴隆的海外贸易中，或者间接地从随着海外贸易相应出现的汹涌的出口浪潮波及的其它行业中，坐享其利。如同在中国其它传统的沿海中心城市所看到的一样，不断扩大的针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商机对人们生计的改善，一般要比仅仅使少数城市商人敛财更为重要。……沿海贸易将不断增加的财富聚集起来，除当地的中国商人之外，外国商人也开始定居在这些地方，并最终组成一个完整的地方社会群落。……沿海贸易成功地将人类、生产、首都和经商活动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巨大的沿海地理区域。国内一体化的模式也从空间上表明，差别悬殊的人口状况、城市区划与乡村结构，也影响了城市形态体系及陶瓷出口业的区域模式。闽南经济扩展，就这样整合并形成了内部区域以及与之相应的和谐的社会结构。而所有这一切，又是与那些泉州以外的沿海区域的中外商人激烈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Conclusion P282）。

“闽南模式”对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极具方法论意义。作者认为，闽南是一个中心综合区域，一个以泉州为中心，颇具个性而又整合区域特征的地区，即“内部整合区域”。所以，对这个模式的探讨，不仅能凸现当地的地域特色，而且还能反映宋元沿海城市的普遍情况。如本书第二部分第六章中，通过对泉州和福州城市人口的同期比较，将两个城市的地域特征及城市功能体现得异常分明。由此推断，“闽南模式”的研究，至少可适用于其它同类型的中古城市。

作者认为，“闽南模式”不仅是对一个地区以往社会经济的概括和研究，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模式》虽然以中古闽南地区为研究对象，但其结论却充满着对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积极思考，体现了作者历史学家式的现实关照。作者在结论中提出，这项课题揭示出的深层意义，不管对中国古代还是当代经济，都具有一定作用，因为“闽南的例子表明，从中国古

代经济中揭示出的基本经济原则，与现代经济发展逻辑决无本质上的矛盾”，可以为当代经济及社会发展提供借鉴（Conclusion P287）。

再次，《模式》对史料的择取不囿于传统，对史料的使用审慎严谨。

《模式》旁征博引，涉猎引用古今中外史料，几乎将关乎中古闽南泉州的材料搜罗殆尽。作者将所有涉及闽南研究的文献划分为四大类：一是涉外关系资料，包括与闽南有关的涉外纪录、外交关系、外国人活动、居住区域、对外贸易等；二是高雅艺术资料，包括闽南地区的艺术理论、民间传说、文化遗产中的技术资料等；三是地方史资料，包括与闽南地方史有关的各种文献、当地学者的著述等；四是社会经济史资料，包括近期围绕宋元泉州社会经济、政治经济的各种研究成果（Introduction P5）。作者搜集和使用资料史料，完全超出了一般经济史或地方史研究的范畴，所以，本书资料翔实，论述缜密，考证可信。此外，《模式》还绘制了不同历史时期与闽南泉州有关的数十幅资料表格和大小地图，为读者提供了详尽而直观的图例；书后所列的参考书目，差不多成为研究宋元时期经济、社会、法律、建筑、中外关系等方面的资料指南。

本书以理论见长，但其宏观立论，能够建立在充分的史料和大量的考证基础之上，如第一部分第一章中的“Djanfou 港口之谜”、第二部分第六章中的“跨地区的陆路交通”、第七章中的“当地精英的住宅分布”等等，都属于考证性的文章。但对那些虽显珍贵但尚待考证或者仍存疑虑的资料，本书一概弃之不用，如有一份相传是中世纪来华犹太商人记录的、关于泉州问题的手稿，记载了蒙古人进入闽南前夕泉州的人口数据、城市生活以及妇女开放的性意识等，尽管这本手稿对于《模式》来说，无疑是一份非常诱人的资料，并且得到了一些学者的重视，但由于对它的来源及部分内容持谨慎的怀疑态度，苏基朗教授表示，在没有得到公认的考证之前，他宁愿忍痛割爱（Introduction P7）。

总之，出版于世纪之交的这本专著，无论从理论上、方法上，还是对史料的使用以及对既往研究成果的吸收上，都是对二十世纪中古泉州研究一个精彩的总结，特别是苏基朗教授提出的“闽南模式”，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我们期待着作者推出更为丰硕的成果，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促进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收稿日期：2003 - 1 - 30；

作者简介：李润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